



《易传》圣人观及其现代意义

(2007-6-19 9:57:39)

作者：韩星

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管子·轻重戊》：“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口之病，而天下化之。黄帝之王，童山竭泽。有虞之王，烧曾薺，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当是其时，民无愠恶不服，而天下化之。”

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比起伏羲时就更多了，据于右任先生在1918年辑古书的记载，仅黄帝时代的发明就有20类（项），包括衣、食、住、行、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可以说，中华民族在后来的几乎所有文明成果，这个时候都有了雏形。炎黄时代进入了文明初曙的时代，这今天已经在不断地为考古发现所证明。远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中游分布着仰韶文化，下游是大汶口文化，上游为马家窑文化。在长江流域，中游存在着晚期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下游为崧泽文化。其中仰韶文化已经被学者们与炎黄时代对应。近30年来，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极多，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说明古籍对黄帝的历史业绩的记载并不是子虚乌有，在仰韶文化的大量文化遗存中，大部分都可以找到物证和线索。

上古“圣人”的发明创造，在《韩非子·五蠹》和韩愈的《原道》中都有记载，说明这些已经成为后世人们普遍的看法。因为上古“圣人”的发明创造与“易”的形成、完善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古圣创“易”的过程，就是中国上古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这里的“易”不仅仅指流传道今天的《周易》，还应该包括已经失传的《连山》和《归藏》。古书中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就提到有三易之法，一是“连山易”，一是“归藏易”，一是“周易”。这三易的经卦都是把八，而别卦则均为六十四。由于前两易的失传，后人说法不一。郑玄引杜子春云：“连山宓戏（伏羲），归藏黄帝。”但郑玄本人则认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也重复这个意见。结合《系辞下传》的说法，今人进行了综合，认为：

如果我们以伏羲时代代表渔猎文化的开始，则在山中狩猎，在水中捕鱼，显然就是“连山易”的经验基础；如果我们以神农时代代表农业文化的开始，则耒耨而耕，秋收冬藏，显然就是“归藏易”的经验基础。从这个文明发展史的眼光来看，“连山”与“归藏”是可以与伏羲和神农联系起来的。这一个说法当然不必与“夏曰连山，殷曰归藏”的说法相冲突。这是由于夏人可以因其渔猎的背景传承“连山易”，而殷人则可以因其农业的背景传承“归藏易”。我们并可进而推测：夏人又自禹疏导洪水，以水为害，故看重山的安稳和凭依，这应是传承“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的理由。至于殷人，由于源出地势较为平坦的东部或东南部，发展农耕，因而崇尚土地，敬拜社稷之神，这应是传承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的理由。

《周易》之成形一般已经公认是殷周之际。《易传·系辞下》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清代刘沅注曰：“上故民情浑朴，中古嗜欲渐开，圣人忧世虑患，做易以诏将来。欲人知圣人忧患之心，体之以自修也。”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清代刘沅注曰：“兴，就文王演易说，谓易道中微而复兴。”

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人与人的关系逐渐由主要转入次要，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具体化为政治关系）的则上升

为主要。《周易》完成之精神动力，便主要的是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政治变革意识和敢于正视承担人间忧患的社会责任感，并进而形成了一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之一。《易传》作者对于《周易》并未进行神秘化的夸张，而是把“《易》之兴也”平实地归结为在特定的艰危处境中人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进一步再具体化，作《周易》的时代环境，乃是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作《易》者（周初统治集团，即文王、周公等）的忧患，就在于“小邦周”要战胜和取代“大国殷”所面对的重重困难和艰危处境，文王因之而被囚于羑里，周公等更面临各种矛盾而怀着无穷忧虑，谨慎从事，始得以转危为安。于是，《易传》作者在肯定了作《周易》者的忧患之后，又从总体上论断《周易》一书：“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始终，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使“易道”凸显了“朝乾夕惕”、“居安思危”、“外内使之惧”“困穷而通”的忧患意识；并强调地指出：天道虽“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而圣人必须“吉凶与民同患”，“明于忧患与故”。这样，就使具体的社会政治的忧患上升到历史治乱兴衰的高度，使小集团的忧患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高度。正因为这种忧患意识促使文王、周公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也完成了《周易》，推动了由天命神权向德治民本的文化转型。后人对此多有感慨，李觏在《易论第十三》中就指出：“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五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古圣在忧患中致力于探讨变革现实，追求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其作《易》的用心所在。后世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应该象李觏一样读《周易》，研究易学，理解圣人的用心，更好的把握易道，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圣人、作易、文明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圣人是主动的，通过观象设卦，使易成为象征天地万物存在、演变以及与人互动的运行历程和法则的符号系统，进而通过尚象制器，使易除了本身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外，又成为人类文明创制的指导思想、基本方法。易道是圣人之道，是文明之道。

二、《易传》圣人观的基本内涵

《易传》对易道的概括，是“今之圣人”对“古之圣人”创易的基本内涵的把握和基本精神的阐发，同时，又是对上古文明的总结，对上古文化的集大成。所以，孔子就被后儒看成是一位“集大成”的圣人。《易传》易道的核心是圣人之道。“易道”统摄天地人三才之道，而只有“人”才是三才之道的主体，圣人又是“人”的文化内涵的凝结，上达天文明天道，下至地理晓地道，中通人事行人道，是三才中和之道的价值承担者。

1、圣人与三才

天、地、人三者是各有特性，又相互作用，有同样的变化法则，如阴阳。但从本质上说来，人与天、地毕竟不同，人在天地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人受天地之中气而生，居天地之中而立，为天地之中介，把天地两个对立项要有机地联系成个整体，并且参赞、调谐天地万物之化育。在天地万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中国古代学者还进一步推论到“人为天地之心”这个命题。其含义是不仅强调人在天地之间的重要性，而且讲人是凭其心的知觉灵明、理性思维能力来把握天地万物的，这样，“人”也就象“心”在人体内的地位与作用一样处于天地之间。

人在天、地之间具有特殊意义，这一特殊意义又集中地通过人中之杰——圣人体现出来。在三才宇宙观中，天、地、人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它们又各具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对人来讲，其行动是否能获取成功，关键看他的行为是否与天地之道相符合。在这方面，圣人给人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和引导。

《周易》的卦象的构成人居中位，是天地之间最重要的一极，《易·系辞下》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与易乃圣人所创制，正是因为有了圣人制八卦作易，使人了解了天地，使人和天地相“交通”，使人通过易占而感通神明，这实质上就是通过人的中介作用使天地相感，鬼神相应，天人合一，人神合一，天地人相应。因此，“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圣人通过卦象的设立与运用，来完成自己沟通天地，治理人间的职责。

圣人如何沟通天地，治理人间？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卦恒》）

圣人能够顺应天地之道，象日月一样普照大地，象四时一样规则变化，刑罚清明，教化及时，自然民心大服，天下太

平。

八卦以卦象显示了天地之中的圣人正担负着沟通天地，调和阴阳的职责，所以《易·文言传》更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里的“大人”就是“圣人”，这在孟子中时或见之，《史记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第 6 页\]](#)

[\[关闭窗口\]](#)